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 從人力資源到人力資本：中國大陸地方經濟成長中政府勞動 管理模式之比較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4-2414-H-263-001-

執行期間：94年08月01日至95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致理技術學院國際貿易系(科)

計畫主持人：張弘遠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5 年 10 月 31 日

## 第一節、前言

中國大陸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其主要發生的變化是出現了市場化與私有化的制度改革。<sup>1</sup>私有化是指中國由過去計畫經濟公有制為主導的環境而逐漸承認私有制的地位，其目的是想透過此舉來提高生產動機與企業運作的效率，進而降低生產成本；市場化則是將原本由行政體系計畫管制的部分，經由去管制化而逐漸交由市場價格來決定，而作法則是試圖將商品市場、中間財市場與要素市場交由價格機制來管理，進而降低交易成本。而在發展的過程中，中國是先「默許」準私有化的現象，然後採取漸進市場化的作為，因此形成了所謂的雙軌制作法<sup>2</sup>，隨著市場機制的引入，競爭產生了影響，再透過價格機制的建立與企業產權的逐漸改革，中國經濟結構出現了較具生產效率與競爭彈性的經濟組織<sup>3</sup>，進而也啟動經濟成長的序列。

隨著市場交易的逐漸普遍，大陸經濟體系出現了新的局面，而其政府透過制度創新的方式，改善金融體系、財政制度、強化外資引入與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sup>4</sup>，進而推動了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間的經濟成長。<sup>5</sup>

就發展的歷程來看，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持續成長，主要的原因在於其所展開的一連串制度改革，然而深究其背後的因素？那麼正確的說法應當是，透過制度的改革進而能夠按照要素稟賦條件按照比較利益原則進行經濟發展，換言之，是因為制度改革進而能夠發揮中國大陸的勞動優勢，因而其經濟發展大部分應歸功於勞動和其他生產要素從低效率部門向高效率部門轉移配置<sup>6</sup>，而非生產效率的提高，拉迪（N. Lardy）更認為，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情況將是中國未來經濟持續成長與否的關鍵。<sup>7</sup>

就此一角度來看，當中國大陸採取經濟改革之後，因為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使得相關企業大多屬於外延式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進而也導致中國逐漸取得世界工廠的

---

<sup>1</sup> 吳玉山，「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之社會影響」，中國大陸研究，第46卷第3期（2003年5、6月），頁23。

<sup>2</sup>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八十五年），頁71。

<sup>3</sup> 張弘遠，「中國大陸經濟轉型中後發展地區政府角色與企業行為」，東亞季刊，第31卷第1期（民國89年），頁54~59。

<sup>4</sup> N. Lardy 著，隆國強等譯，中國未完成的經濟改革（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頁2~8。

<sup>5</sup> Peter Nolan, *China's Rise, Russia's Fall*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5), pp180~184。

<sup>6</sup> Tony Saich,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 238~242.

<sup>7</sup> N. Lardy 著，隆國強等譯，中國未完成的經濟改革（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頁9~10。相同的觀點可以參見道赤·童，「中國改革的三大戰役」，見胡鞍鋼主編，中國走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頁199~200。

生產地為，而此時廠商利潤與經濟成長的成果主要是來自於要素的貢獻<sup>8</sup>（主要來自於低廉的勞動與土地），就某種意義而言，要素稟賦優勢的運用是中國經濟得以「持續」成長的主要因素。<sup>9</sup>

若根據上述分析來看，那麼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便是要持續強化勞動要素優勢的發揮，同時增進勞動生產力，若欲如此，一方面應自供給面上提升勞動要素的供給數量與強化勞動要素市場的分配功能；另外一方面則應提升勞動要素的邊際生產力。那麼要如何才能夠達成上述兩個目標？是透過市場機制自然演進而取得上述成果？或是透過政府政策輔導而達成目標？哪一種方式對於中國大陸地方經濟發展的作用較佳？

本研究主要的觀點在於，從過去到現在，在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中，地方政府在當地經濟發展模式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sup>10</sup>，無論是消極無為或是積極進取都有其成功的例證，然而若就長期發展的角度來看，如何有效的建構出一個能夠提升勞動生產力與勞動分配效率的制度，則又是關係到現階段中國大陸地方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那麼政府該如何作為？或是如何不作為？才可以達成此一目標？此外，中國大陸地方經濟成長擁有取多不同的模式，不同模式中的地區在面對不同的勞動供需條件時，其地方政府的作為會對此產生何種影響？所產生的管理模式或制度又會為地方經濟成長帶來何種變化？這便成為筆者關注的焦點。

## 第二節、經濟發展中的勞動要素——相關理論概述

對於發展中國家與低度發展國家而言，如何盡快地脫貧致富、提升經濟發展是其政府施政的主要目標，然而人為的努力是否真的能夠扭轉結構所存在的差異？經濟增長的原因有三：經濟活動、知識的增長以及資本的增加，<sup>11</sup>那麼是否存有一條捷徑能讓發展中國家迅速地趕上已開發國家的經濟水平？對於此一現實的需要，經濟學家又是如何回應？首先，我們由發展經濟學的脈絡來理解討論經濟發展的若干主要觀點。

### 壹、二元結構經濟發展理論中的勞動要素

發展經濟學主要關注的是，發展中國家如何由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中，扶植工業部門的成長，而關注的焦點則在於如何利用農村部門提供工業部門初期啟動與中期發展所需要的勞動與資本。若是要探討經濟成長中勞動因素所扮演的角色與相關的政策設計，

---

<sup>8</sup> 舒元、徐現祥，「中國經濟增長模型的設定：1952--1998」，經濟研究，第11期（2002），頁9。

<sup>9</sup> 在此必須強調，中國經濟成長的初期階段，主要受益於商品市場開放所產生的效果，因為商品市場開放，再加上過去短缺經濟的條件，使得許多新興廠商能夠因商品生產而獲得利益，但是隨著市場逐漸飽和與低品質消費商品的淘汰，此時維持企業持續獲利的主要因素便是在於要素稟賦上的優勢。

<sup>10</sup> 陳劍波，「鄉鎮企業的產權結構及其對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盛洪主編，中國經濟學-199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155~157。

<sup>11</sup> 劉易士著，梁小民譯，經濟增長理論（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10月），頁20。

那麼在發展經濟學理論中，最為學界援引的便是由劉易士 (A. Lewis)、費景漢與拉尼斯 (G. Ranis) 等人所提出了二元結構發展理論，而對照中國大陸經濟轉型初期所產生的相關情勢，則此一理論中的相關論點似乎正是大陸經濟成長的寫照。

在劉易士 1954 年所發表的論文「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中，其假設：在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下，由於農村勞動的邊際生產力趨近於 0，因而造成其勞動是無限供給；技術進步則為中性；同時假定資本家將所有的工業利潤都用於資本積累，增加投資。劉易士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中勞動力為無限供給，此時資本屬於稀少資源而勞動要素稟賦則是豐富；第二階段中，由於長期移轉的結果，勞動要素也成為稀缺資源，從而無法無限供給。

首先在技術中性的條件下，工業部門在資本家重複投入的情況下出現了資本擴張的狀態，因而擴大了對勞動的需求，又由於工業部門的工資高於農業部門，因而促使農村勞動力願意移轉至工業部門，這一過程不斷地重複的結果使得進入工業部門工作的農業勞動力逐漸增加，最終當農業剩餘勞動力移轉完畢之後，此時進入第二個階段，由於現時勞動成為稀缺要素，對於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將會導致工資水平的上升。<sup>12</sup>

簡單歸納之後，吾人可以發現劉易士的「二元經濟」發展理論主要是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體系劃分為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兩種經濟，劉易士認為，產量增長的速度是由現代部門的工業投資率和資本積累率所決定<sup>13</sup>，一國若欲追求經濟成長則必須扶持工業部門，而扶持工業部門的主要做法則是設法自農業部門中抽取所需要之勞動力，以低價投入的方式降低工業部門運作成本。

也正因為劉易士假定傳統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趨近於 0，因此主張利用農業部門的失業勞動力，投入工業部門生產以加速資本積累，但是要如何做才能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劉易士指出，由於工業部門工資水平遠遠高於農業部門，因此農村剩餘勞動力的供給將會自然流入工業部門。

然而托達羅 (M. Todaro) 認為此一模型存有三個問題：<sup>14</sup>

- 一、 劉易士的模型假定現代工業部門的勞動轉移率和就業創造率與現代部門的資本積累率成比例，因此資本積累率越高，則現代部門增長率也就越高，同時所創造的就業機會也越高，但是在現實情況下，資本家常在獲利之後移轉資本進行轉投資。
- 二、 劉易士的模型假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中，農村部門存有大量剩餘勞動力，但在城市部門則為充分就業的狀態，事實上，在發展中國家的城市中也存有大量的剩餘勞動力。

---

<sup>12</sup> 劉易士著，梁小民譯，經濟增長理論（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10月），頁30~40。另見，張秀生、陳先勇，「二元結構與經濟發展」，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學術論文，見 [www.ncer.tsinghua.edu.cn/lunwen/paper2/wp200202.doc](http://www.ncer.tsinghua.edu.cn/lunwen/paper2/wp200202.doc)。

<sup>13</sup> 托達羅 (Michel Todaro) 著，于同申、蘇蓉生譯，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上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3月），頁100。

<sup>14</sup> 托達羅 (Michel Todaro) 著，于同申、蘇蓉生譯，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上冊，頁102~104。

三、此一模型假定現代工業部門存有一個競爭的勞動力市場，用以保證農村剩餘勞動力在被完全吸收以前，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將不會變動，但是實際上受到工會力量、公務員薪資水準等因素的影響，城市工資有上漲的趨勢。

由於劉易士模型中所存在的上述缺點，因而費景漢—拉尼斯兩人在1961年產生了新的模型假設，費氏與拉氏認為劉易士模型忽視了農業促進工業增長方面的重要性以及農業勞動力向工業流動的先決條件，因此有修正之必要，兩人並在1964年「勞動力剩餘經濟的發展」一文中加以完整的闡述。

費景漢與拉尼斯的模型中最重要觀點是將二元經濟中的農業勞動力的轉移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等於零的階段，該階段的勞動力為自由轉移，農業勞動產出並不會因此而降低，相關的農業糧食生產並不會出現短缺；第二階段，是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大於零但小於基本工資的階段，這一階段的勞動力轉移會因為農業總產出下降而偏好前往工業部門；第三階段，是農業邊際生產率大於基本工資，由於農業部門的邊際勞動生產率等於或大於城市工業部門，因而使得農業工資水準開始高於工業部門工資水準，此時工業部門若要吸引農業勞動力就必須提高本部門的邊際勞動生產率，使其至少等於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sup>15</sup>

費景漢和拉尼斯認為，問題主要是出現在第二階段中，如何將農業部門中的剩餘勞動轉移到工業部門中去，因為在勞動力轉移進入到第三階段之前，由於農業部門缺乏勞動力的結果，使得農業產品價格就上升，從而工業部門在支付農業部門轉移的勞動力時，就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資，這樣工業部門的貿易條件也就越不利，進而導致工業部門利潤減少進而停止擴張，從而導致勞動力移轉的現象停止。<sup>16</sup>

費景漢與拉尼斯指，上述情況若是能夠伴隨著農業部門由傳統進化至現代，則由於農業邊際生產力有所提升，因而將有可能化解工業部門停止擴張的危機，換言之，當農業現代化之後，農業與工業間的勞動力流動完全取決於邊際生產力的變動，也就是農工部門所能提供的相對工資水準將會決定勞動力轉移的趨勢。<sup>17</sup>

然而由劉易士—費景漢—拉尼斯三人所建構的模型因為建立在已發達國家的現實條件上，因而很難有效解釋對於發展中國家城市失業及農村人口大量湧向城市等現象，使得後繼學者進一步的加以修正，其中托達羅在1969年提出新的修正，其指出勞動要素的流動是一種經濟行為，不管城市是否出現了勞動剩餘的情況，勞動流動的是比較利益與成本的理性經濟考慮<sup>18</sup>，農業部門勞動力是基於理性預期而非城鄉收入差距來進行

---

<sup>15</sup>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分析」，中國農業信息網，  
[http://www.agri.gov.cn/jjps/t20030620\\_93790.htm](http://www.agri.gov.cn/jjps/t20030620_93790.htm)。

<sup>16</sup>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分析」，中國農業信息網，  
[http://www.agri.gov.cn/jjps/t20030620\\_93790.htm](http://www.agri.gov.cn/jjps/t20030620_93790.htm)。

<sup>17</sup> 倪丹容，「中國二元經濟的歷史邏輯和結構剛性」，經濟學家網站，  
[http://www.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1555](http://www.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1555)。

<sup>18</sup> 常偉，「保護民工權益的經濟學意義」，淮海學苑網站，

是否移轉的選擇，農村勞動力根據預期所得到的期望值（如獲得工作機會的機率乘以工資報酬等）進而決定是否投入城市工業部門，也就是說，預期收入才是最終對勞動人口遷移產生影響的因素，當預期收入大於勞動力從農村遷到城市的成本時移轉就會發生。

19

總結上述所言，在相關的二元結構理論觀點之中，經濟學者們主要是將關注的焦點放在如何有效的促進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的勞動力移轉，而其主要的關鍵在於兩部門邊際生產力（也就是工資水準）或是工資預期所能發揮的作用，而近年來經濟成長理論出現了明顯的改變（主要是指內生性技術進步的經濟成長理論），也因此使得相關模型有所修正，其中筆者認為能與大陸現今勞動管理情況作為參照的便是楊小凱對於勞動分工的相關論述。<sup>20</sup>

## 貳、楊小凱的勞動分工理論

楊小凱的勞動分工理論不同於過去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成長理論，其從「楊格定理」中獲得啟發而發展出勞動分工理論。<sup>21</sup>楊氏的觀點可上追溯到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勞動分工概念，簡言之，分工起因於交換能力，分工的程度則受到交換能力高低大小的限制，也就是受到市場範疇的限制。其後，楊格（A. Young）進一步發揮此一觀點，其認為：勞動分工依賴於市場範疇，而市場不僅是由人口、區域等決定，更是以購買力決定，而購買力由生產力決定，生產力則是由分工決定。這個「勞動分工水準自我演化」的觀點，便是楊格定理。<sup>22</sup>

楊小凱認為，假定交易效率是交易規模的增函數，如果交易效率提高，均衡分工水平便會上升，反而會擴大交易規模，因而提高交易效率，並刺激分工水平的再次提升。<sup>23</sup>根據楊等人的觀點，由於存在著專業化利益，因此會使原本自己自足的經濟體系逐漸出現勞動分工的狀態，專業化所導致的分工雖然能降低生產成本，但卻會使產品交易成本跟著增加，在這兩項條件下，專業化將會存有一個最適解。在楊的模型中，專業化的

---

<http://web.cenet.org.cn/web/hhxueyuan/index.php3?file=detail.php3&nowdir=&id=6900&detail=1>

<sup>19</sup> 「農業勞動力移轉」，深圳勞動信息網，<http://www.shenzhen.molss.gov.cn/information/g4-09.html>

<sup>20</sup> 楊小凱理論觀點參考自下列著作：楊小凱、張永生著，*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楊小凱、黃有光著，張玉綱譯，*專業化與經濟組織——一種新興古典微觀經濟學框架*（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楊小凱，*勞動分工網絡的超邊際分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sup>21</sup> Xiaokai Yang and Jeff Borland, “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 收錄於楊小凱著，*勞動分工網絡的超邊際分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 417~436。

<sup>22</sup> 聶輝華，「新興古典分工理論與欠發達區域的分工抉擇」，*經濟科學*，第 3 期（2002 年），頁 113。

<sup>23</sup> 聶輝華，「新興古典分工理論與欠發達區域的分工抉擇」，*經濟科學*，第 3 期（2002 年），頁 113。

決策將會決定當時勞動分工的水準，而勞動分工水準又會影響經濟成長，簡言之，勞動的分工將擴大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擴大又會反過來促進勞動分工的演進，不過，其同時也會提高交易成本，最後，當過去專業化利益的貼現值與交易成本提高所損失的經濟效用相等時，勞動分工水準和經濟成長率將會達到均衡。

在分工利得與市場交易成本相等時，此時將會出現一個動態的均衡，不過因為專業化生產中，人們會因為學習效果的出現而累積更多的生產經驗，進而提高了生產技術改進的可能，一旦這種可能出現，那麼將會導致生產能力增加而成本降低，專業化收益將會提高。

而當人們在專業化中得到的收益大於市場規模決定的交易成本時，就又会選擇更高的專業化水平，而分工便會邁向更高的水平，當勞動分工演進到一定水平並保有進一步分工的潛力時，則平均收入的成長率就會不斷提高，從而導致經濟有可能因為分工深化而持續成長。<sup>24</sup>

### 參、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中勞動供需之政經模型

簡述相關經濟發展理論中對於勞動力要素的討論之後，本文主要將結合二元結構模型與楊小凱勞動分工理論的觀點，針對大陸地方經濟成長中政府勞動要素管理模式提出一個分析概念-「政府干預下的勞動管理」模式，用以說明目前大陸地方經濟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如何透過對於地區勞動力市場的政策干預，進而決定了地區勞動工資水平、勞動條件與勞動分配效率的高低。

由於經濟快速的發展使得大陸沿海各地對於勞動需求逐漸上升，雖然需求上升，但是由於大陸農村勞動剩餘數量龐大，特別是近年來大陸出現通貨緊縮的現象，農村所得增長有限，因而使得農民外出務工的現象十分普遍，因此總體的勞動供給始終能夠滿足其經濟生產所需。

然而在快速的經濟發展之後，不同區域間出現了不同的經濟成長模式，某些地區持續依賴外延式的經濟成長策略，採取壓低工資、降低生產成本的做法，因而導致勞動收入無法增加。但有些地區則因為管理技術或教育訓練等因素而出現節省勞動型的技術進步，勞動要素的邊際生產力增加，進而出現了內涵式的經濟成長。

不管是外延式成長或是內涵式成長，就企業的角度而言，工資增加便是成本的增加，因而就理性的角度而言，在確保員工對於工作投入的前提之下，維持一定的工資水準便是其理性策略的選項。但若勞動替代門檻較低，則在勞動充分供給且為資方市場主導的情況下，企業甚至可以不管其工資水準是否合理，採取不合則去之的策略，持續的使用低工資的策略。

那麼在中國大陸勞動力剩餘豐富的情況下，似乎企業持續採取低工資的作為是一條可行的道路，然而，若就勞動要素的邊際生產力而言，西方經濟學界的研究早已指出透

---

<sup>24</sup> 姚愉芳、賀菊煌等編著，中國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理論、模型與應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頁36~49。

過對於教育訓練與人力資本的投入，對於經濟成長將會帶來直接的效益<sup>25</sup>，那麼除了企業基於自身的考量進行人力資本的投入之外，地區經濟發展模式當中，是否能夠出現推動由人力資源轉向為人力資本的勞動管理模式，便成為一個左右地區經濟成長效益的關鍵。

而就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現況來看，似乎不同的地區對於勞動要素的認知亦有所不同，有些地方將勞動力視之為人力資源，有些地方卻已經出現了將勞動力提升為人力資本的作法，而在這樣的差異中，本文所欲探討的是，地方政府的作為是否是導致此一差異的顯著因素？

本文認為，在後社會主義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政府仍然必須承擔保護勞動權益的責任，然而過去大陸經改在強調發展的情況下，因此暫時忽略了對於勞動權益的照顧（近年來這種疏忽已經付出了許多重大的社會成本），而在強調市場機制的情況下，似乎地方政府並無直接干涉工資水準的必要。換言之，地方政府是否採取積極建構良好的勞動管理作為，這並非是一個義務，而是一個選擇，也因此本文認為透過觀察地方政府對於工資水平的態度與作為，將可以切入地方政府對於勞動管理的能力此一議題，進而關照後社會主義市場轉型中地方政府的經濟角色此一命題，因而在此提出了「政府干預下的勞動管理」模式作為分析的概念。

此一概念的分析角度是去關照為何在市場機制至上的中國大陸，仍有許多地方政府會在其地區經濟成長的規劃中，針對農業資源投入與工業資源分配進行權衡，以確保廠商生產為前提，透過政策介入、政府輔導與政企合作的方式，對於當地勞動力市場進行良好的規劃與建構。<sup>26</sup>

本文相信，良好的勞動管理模式將能夠擴大勞動市場交易規模，而勞動市場規模擴大引發了勞動供給種類與功能的分化，進而導致勞動分工效果出現，而勞動分工所產生的技術進步與製程分解，使得員工學習成本降低，提高了勞動生產力，進而能夠創造更高的工資水準。倘若地方政府在取得勞動生產力提升的情況下，能夠強化廠商配合的意願，進而得以制訂相關勞動保護措施，與改善城市中勞動生活條件，強化對於人力資本的投入，這將會建構出有利於經濟持續成長的環境。

換言之，地方政府能否有效的協助勞動力市場發展，強化勞動分配與供給的效率，進而取得勞動生產力提升的效果，同時透過政策引導，增加當地工資水準與工作條件，這便成為當地的勞動供需情能否趨於均衡的一個重要變數。

### 第三節、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中的勞動供給及管理

---

<sup>25</sup> 姚愉芳、賀菊煌等編著，中國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理論、模型與應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頁36~49。

<sup>26</sup> 關於政府如何透過勞動體制的管理與作為，進而型塑出不同的經濟模式等觀點，可參見 Kathleen Thelen, *How Institutions Evol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人民網，「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089/5106/5179/20010430/456592.html>。



## 壹、中國大陸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運作

若是要對中國大陸勞動管理體制進行深入探討，那麼追本溯源應該要自 1986 年開始，過去由於中國勞動體系處於封閉的狀態，並非以市場的形態進行交換，所以大多是由政府進行調節與分配，然而改革之後，為了配合產業發展需要，因而促使其發展出能夠自由進行溝通與交換的勞動市場，而這便導致了中國勞動體制的改革。

最早的改革是在深圳特區實行進行「勞動契約制」，在 1986 年 7 月中共國務院頒佈了「關於國有企業實行勞動契約制的暫行規定」，開始在相關企業中推廣勞動契約制。其後在 1993 年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在關於培育和發展市場體系的討論內容中，文件指出：「改革勞動制度，逐步形成勞動力市場。我國勞動力充裕市經濟發展的優勢，同時也存在著就業的壓力，要把開發利用和合理配置人力資源作為發展勞動力市場的出發點。廣開就業門路，更多地吸納城鎮勞動力就業。鼓勵和引導農村剩餘勞動力逐步向非農產業轉移和地區間的有序流動。發展多種就業形式，運用經濟手段調節就業結構，形成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雙向選擇、合理流動的就業形式。」<sup>27</sup>

而在 1995 年則正式頒佈了中國第一部勞動法，於所有企業正式推動勞動契約制，中國勞動體制的精神從「身分」轉變為「契約」勞動契約制取代了過去「大鍋飯」式的身分體系，給企業充分的自主權，這是根據「市場信號」而不是計畫指標來聘用工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種根據企業需要與勞動供給情況所建構的勞動力市場的雛形於是出現，但由於過去計畫經濟時期的歷史影響，因而導致中國勞動供需雖然自指令計畫中掙脫，但是卻仍然受到過去歷史因素影響，進而出現了市場分割的情況。直到 2005 年，此一情況仍持續存在於中國經濟體系之中，例如中共國務院便指出：「加快建設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進一步改革勞動就業管理制度，清理對農民進程務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亂收費，取消各種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歧視性管定，進一步改革戶籍管理制度，促進農村剩餘勞動力合理有序的移轉，選擇部份具備條件的城市開展城鄉一體化勞動力市場的試點工作。」<sup>28</sup>

何以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情況如此嚴重？一般論者以為，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的過程反映城鄉分割、社會階層分化被配置到勞動體系中的過程，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形態主要是區分為：城市勞動體系與農村勞動體系，這主要是為了與戶籍制度相配合。

---

<sup>27</sup> 人民網，「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089/5106/5179/20010430/456592.html>。

<sup>28</sup> 中國政府創新網，「國務院關於 2005 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意見」，<http://www.chinainnovations.org/cxfg/ArticleShow.asp?ArticleID=231>。

<sup>29</sup> 趙憲生，「全球化與中國勞工市場分割：珠江三角洲外來勞工的個案研究」，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 21 期（2001 年冬季），頁 1-39。

首先，在城市勞動體系中，其只針對城市居民提供就業的服務，城市居民除了由國家提供工作之外，還享受一整套的福利條件，包括免費的住房，公費醫療，教育，退休金與日常生活必須的供應物資，而勞工則被分配在國營企業事業或集體企業單位工作，其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完成政府設定的工業指標。

其次，在農村勞動體系中，改革之前，農民是集體進行勞動，由幹部按照工作情況進行工作安排與所得分配，而改革之後，則農民仍須按照官訂價格來為城市居民提供糧食，以此作為農業稅上繳，處分之後的剩餘則才能以所得的形式來加以保留。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發現，中國勞動力市場受到過去計畫經濟歷史的影響使得整體工作性質被區分為三個領域：幹部、工人和農民。而這三者則又分別受雇於城市主要勞動管理體系，城市次要勞動體系和農村勞動體系。

然而隨著改革的發展，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情況也出現了變化，而主要是出現在農村勞動力市場之中，最明顯的便是農民的身分出現了多元的轉化，如：農業勞動者，鄉鎮企業工人，農民工，私營企業主，個體戶，鄉鎮幹部，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等等，農民不僅出現了地域流動，同時也出現了向上流動。

與農民相比，城市工人沒有取得職業等級的垂直流動和地域流動，但是得以在不同企業所有制的橫向流動，即是從公有制企業流向非公有企業，雖著勞動契約制的實行，城市工人從終身固定工變成契約工，雖然丟掉了鐵飯碗，但是卻獲得了選擇職業和雇主的自由。<sup>30</sup>

## 貳、中國大陸農工部門的勞動移轉

過去中國大陸為了要追求工業化的目標，因此透過對農業部門的剝削來取得工業化所需的資源與勞動<sup>31</sup>，進而將整個經濟社會分割為城市部門與農村部門，強力執行抽農補工的政策。<sup>32</sup>

在這樣的政策執行下，中共當局又是如何發展農村經濟？其主要的手段是採取農業合作化的方式，以組織合作化輔以意識型態動員的方式來追求農民生產的效率，然而由於人謀不臧、政策錯誤，進而導致整個農村經濟體系的嚴重衰退<sup>33</sup>，正因為未能採取緩進的經濟發展策略，合理的分配農工部門發展資源，同時在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中利用經

---

<sup>30</sup> 趙憲生，「全球化與中國勞工市場分割：珠江三角洲外來勞工的個案研究」，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 21 期（2001 年冬季），頁 1-39。

<sup>31</sup> 林毅夫，再論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264-265。

<sup>32</sup> 如：一、以戶籍登記制限制地區間的遷移，特別是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二、要求農村部門採經濟運作能夠自給自足，國家大部分的資金大多投注於城市經濟的發展上；三、國家在財政支出的分配上，基本是只提供城市地區如食物、醫療、教育、住宅、福利等津貼；四、以剪刀差的方式進行農業資源的移轉。K. Lieberthal 著，楊淑娟譯，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頁 288。

<sup>33</sup> 陳佩華、趙文詞、安戈，當代中國農村歷滄桑—毛鄧體制下的陳村（香港：牛津大學出版，1996），頁 21~23。

濟政策來控制生產誘因，以此提高農業產量並維持農業集體化組織的運作，進而導致大陸農村經濟陷入尷尬的處境<sup>34</sup>，而農村經濟的衰退直接影響了城市穩定與工業發展，農村糧食必須透過國家分配以避免發生供給不足的現象，而城市國有工業部門低效率的運作也造成勞動力出現供給過剩的情況，進而導致原本所設計的農工二元發展模式失去作用，進而也為日後經濟制度變遷留下伏筆。

當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之後，農村地區由於制度創新（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進而提升了農業部門中的勞動生產力<sup>35</sup>，農業生產力的提升增加了農村資本的快速累積，農村自身的剩餘勞動加上所積累的資本在缺乏進入城市工業部門的管道下，導致了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趨勢。

然而中國大陸農村經濟的現實條件是人口眾多且個人分配耕地面積少，所以不管是家庭聯產承包制或是人民公社，類似的制度變遷所引發的經濟成長往往很快地便會出現邊際收益遞減的現象<sup>36</sup>，根據調查，自一九九七年以來，由於糧食供過於求，市場糧價不斷下滑，因此使得農村家庭經營收入下降。<sup>37</sup>

也因為大陸農業經濟的發展逐漸減緩，約束農民收入的增加<sup>38</sup>，所以整體農業產量雖然增加，但是農民的平均收入的增長卻未同步<sup>39</sup>，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打工所獲得的收入便具有相對吸引力<sup>40</sup>，由於經濟改革帶來的東南沿海區域經濟成

---

<sup>34</sup> Dali L. Yang,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2。

<sup>35</sup> 杜吟棠，「農村所有制結構與效率的實証分析」，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組織與制度研究室，大變革中的鄉土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頁 50-51。

<sup>36</sup> 改革之後，由於聯產承包制度的出現與計畫經濟體制的鬆動，農村經濟運作逐漸地市場化，進而帶動了地方經濟的發展，然而隨著改革的腳步發展，農業生產力的增幅與農產品價格的成長速度卻逐漸減緩，但是農村勞動力成本與生產要素的價格卻不斷上漲，一來一往之間，由聯產承包制所帶動的農村經濟成長便面臨瓶頸，相關的討論可以參見胡鞍鋼，中國發展前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頁 293-297。

<sup>37</sup> 自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五年以來，中國農村居民人均總收入每年平均為 20.11%，在一九八五到一九九九年，平均也有 16.02%，但是問題出在一九九七到一九九九年，這三年農村居民人均總收入只增長了 2.17%，農村居民收入減少的趨勢已經出現，見徐連仲，「農村居民收入變化及影響因素分析」，農村經濟問題，第五期（2001 年），頁 20。

<sup>38</sup> 根據研究，由一九八〇到九九年以來，農產品市場需求的增長率大約是年均 12%，而此需求已逐漸減緩，其次，九〇年代之後，全國居民人均食品消費支出約為 2%，而農民收入增長率與全國居民人均食品消費支出率基本相近，因此也為 2% 左右（但是倘若扣除掉通貨膨脹率的話，那麼有些地方的農民收入便有可能是負成長），見王萍萍，「農民收入與農業生產結構調整」，戰略與管理，第 1 期（2001 年），頁 87。

<sup>39</sup> 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2000 年農民收入增長速度繼續放慢」，農業經濟學，第 6 期（2001 年），頁 131-132。

<sup>40</sup> 徐連仲，「農村居民收入變化及影響因素分析」，農村經濟問題，第 5 期（2001 年），頁 22。

長所造成的勞動需要，再加上沿海城市現代化的陸續進展，使得農村人口出現外流至城市工業部門的趨勢，此時應屬於前文劉-費-拉三人所建構的二元模型中第一時期至第二時期之間，由於當時中國大陸農村糧食仍以國家收購為主，在價格控制的情況下，農民透過農務所得增長有限，因而無法滿足其所得增加的需要，那麼前往沿海從事工業勞動便成為一個合理的選項，而當地工業部門所需要又非技術性勞動，簡單的勞動技術要求也降低了農民外出務工的成本需求，再加上城市與農村生活條件上的差距，因而使得農村人口外移前往城市的現象逐漸普遍。<sup>41</sup>

但是近年來這些情況卻出現變化，首先，由於農村經濟的問題引發中共高層的關注，進而開始一連串農村改革；其次，鄉鎮企業發展的升級，對於勞動力需求出現變化；最後，城鎮下崗居民增加，導致農村勞動力工作機會減少<sup>42</sup>。

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村人口外移打工的行為模式出現了變化，而對此或許正是托達羅模型中所言的情況，廠商需求轉變與農民務工預期行為的修正，導致了大陸近期出現了部分經濟發達地區勞動力供給不足的現象。

## 參、中國大陸近期勞動供給短缺的原因

### 一、工資條件與工作環境的影響

既然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與勞動供給及分配有著如密切的關係，那麼近期以來大陸部份地區所出現的勞動供給短缺的現象便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重點，為何人口總數可能高達十三億的中國，農村閒置勞動人口高達數億的大陸會出現勞動供給短缺？這似乎有違常理，但是根據大陸官方所作的調查顯示，部份經濟發展地區的確出現了明顯的勞動短缺現象<sup>43</sup>，

何以中國大陸會出現此一情況？根據研究顯示，主要的原因在於：工資過低與工作環境惡劣，若從大陸媒體所披露的資料來看，珠江三角洲地區在過去 12 年以來，一般勞動（農民工）的月薪只提高了 68 元，如佛山，月薪在 10 年前便是 600-1000 元，但如今仍是維持現況。若就平均薪資來看，目前廣東一般勞動（民工）的平均月薪比江蘇低 160 多元；珠三角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廣州為 510 元，甚至低於山西、江西 520 元的標準，東莞為 450 元，深圳特區外最低工資扣除個人應承擔的社會保險費後為 388 元。福建莆田和泉州的最低工資是 350 元。<sup>44</sup>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部分沿海地區（如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等地）許多產業主

---

<sup>41</sup> 「中國經濟增長未來有三大引擎」，聯合早報網，  
[http://www.zaobao.com/cgi-bin/asianet/gb2big5/g2b.pl?/cj/cj504\\_061204.html](http://www.zaobao.com/cgi-bin/asianet/gb2big5/g2b.pl?/cj/cj504_061204.html)

<sup>42</sup> 徐連仲，「農村居民收入變化及影響因素分析」，農村經濟問題，第 5 期（2001 年），頁 23。

<sup>43</sup> 「畸形的城鄉差距縮小 民工荒到底荒在哪？」，中國經濟網，  
[http://big5.ce.cn/new\\_hgj/hgplun/more/200409/16/t20040916\\_1775764.shtml](http://big5.ce.cn/new_hgj/hgplun/more/200409/16/t20040916_1775764.shtml)。

<sup>44</sup> 「畸形的城鄉差距縮小 民工荒到底荒在哪？」，中華工商時報（大陸），  
[http://big5.ce.cn/new\\_hgj/hgplun/more/200409/16/t20040916\\_1775764.shtml](http://big5.ce.cn/new_hgj/hgplun/more/200409/16/t20040916_1775764.shtml)。

要依靠非技術性勞動作為主要生產力，這種勞動密集型產業（特別是出口導向的產業）的主要競爭力來自於價格，不少企業為了壓低成本，因而苛扣一般勞動力的工資，同時減少對於改善工作環境的投資，這種現象普遍的存在於中國大陸目前經濟發達的地區。一方面是工資過低與工作條件惡化，另外一方面，近年來由於西部大開發的作用，再加上中共中央對於農村經濟條件的一系列改善作為，使得大陸中西部地區企業工資和農業比較收益有所提高，與外出勞動的工資收入差距縮小，導致外出勞動人員對工作收入的預期提高，對現存的勞動條件、工資待遇感到不滿，這促使許多過去願意到外地打工的農村勞動力或中西部人口，逐漸失去了外出從事勞務活動的意願，進而導致勞動供給的數量開始減少。

勞動力供給減少的結果，使得目前珠江三角洲、閩東南、浙東南等地的加工製造業聚集地區出現了勞動供給不足的現象，而其中罪明顯的是缺乏 18~25 歲的年輕女工和有一定技能的熟練工，而缺乏勞動力的產業則多是以「三來一補」為主要經營形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同時也集中在產品競爭比較激烈的製鞋、玩具製造、電子裝配、服裝加工、塑膠製品加工等行業。<sup>45</sup>

除了非技術性勞動力短缺的現象之外，大陸學者也發現中國經濟發展也面臨到技術性勞動短缺的瓶頸，由於大陸現有勞動密集型產業部門中，有許多企業主要是由過去鄉鎮企業轉型而來，這類型的中小企業由於過去十分依賴廉價勞動力的投入作為利潤來源，在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上少有作為，也缺乏對於企業員工投資的訓練，短缺人力資本的投入結果，導致非技術性勞動始終無發獲得充分的訓練進而壓低了勞動生產力，而低勞動生產力的條件約束了廠商調整工資時的能力，進而導致了員工出現了「逐工資而居」的移動狀況，也就是說，若當地工資條件始終無法改變，那麼勞動力若不是移往工資報酬較高之地，便是失去了持續工作的意願。<sup>46</sup>

## 二、區域經濟發展下勞動移轉條件的改變

那麼若現屬情況為前者，則其移動的區域又是何處？就相關的研究成果顯示，目前企業勞動供給短缺的情況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閩東南、浙東南等加工製造業聚集地區，然而最近快速發展的長江三角洲類似情況卻似乎較為和緩。<sup>47</sup> 若就本研究的議題來看，則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似乎是一個很好的對照（兩地情況參見表 1）。

表 1 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基本情況比較（2000 年）

指標	土地面積	GDP	人均	出口總額	三資企業實	全社會固
----	------	-----	----	------	-------	------

<sup>45</sup> 「國家發佈民工荒調查報告：四原因導致民工短缺」，中國經濟網，  
[http://big5.ce.cn/new\\_hgj/hgplun/more/200409/08/t20040908\\_1701970.shtml](http://big5.ce.cn/new_hgj/hgplun/more/200409/08/t20040908_1701970.shtml)。

<sup>46</sup> 「國家發佈民工荒調查報告：四原因導致民工短缺」，中國經濟網，  
[http://big5.ce.cn/new\\_hgj/hgplun/more/200409/08/t20040908\\_1701970.shtml](http://big5.ce.cn/new_hgj/hgplun/more/200409/08/t20040908_1701970.shtml)。

<sup>47</sup> 「勞動力短缺：中國勞動力市場發生史無前例的結構性變化」，中國觀察，<http://china.intlshop.com>。

	(平方公里)	(億元)	GDP(元)	(億美元)	際利用外資 (億美元)	定資產投 資(億元)
長三角	99,687	15,350.8	18,344	641.79	127.45	4,820.94
珠三角	41,698	7,378.58	31,990	847.41	125.41	2,291.64

轉引自：孫祖培，「增長與極限—長三角與珠三角區域經濟發展比較」，陳德昇主編，**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台北：五南，2003），頁 322。

基本上，若由經濟成長來源來分析中國大陸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兩大經濟區域，則可發現其成長來源明顯有所不同。<sup>48</sup>首先，就投資的角度來看，長江三角洲是以投資推動，由於長江三角地區擁有較佳的基礎設施、科技教育和政策環境，成為跨國企業及國內私營企業投資焦點。珠江三角洲則是以出口拉動，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珠江三角地區憑藉其鄰近港、澳和「華僑之鄉」優勢，以「三來一補」的方式吸引境外投資，成為中國大陸國際貿易最發達的地區。

若就不同地區中企業主要的性質來看（依所有權進行區分），那麼長江三角洲是「私營主導」，珠江三角洲則是「外資推動」，其外資主要來自香港、台灣、東南亞及海外的華僑投資。

長江三角洲多為高科技及知識密集產業，此區由於產業類別較多，輕重工業兼具，惟目前中國大陸最大的綜合工業區域。而珠江三角洲則以勞力密集產業為主，由於珠江三角產業主要為加工出口貿易導向，多以服飾、玩具、家電等勞力密集型產業為主，該區為全中國大陸最大的電子和消費品生產出口基地。

珠三角與長三角同屬經濟快速發展的地區，對於勞動力的需求應該同樣殷切，但是何以珠三角勞動缺乏的現象明顯大於長三角？是因為兩地主體產業部門的不同？抑或是兩地發展策略的差別？還是兩地經濟發展模式中對於要素管理能力上的差距？就前兩項而言，兩地主體部門雖有所不同（表二），但是卻亦有重疊，且兩地產業多以外向出口為主，故其影響應非主要，合理的推論應該在於兩地發展模式中對於要素管理能力的差距所導致。

表 2、中國大陸區域經濟重點產業發展項目

區域	省份	產業項目
東部 沿海 地區	上海	紡織、化工、鋼鐵、微電子、生物技術、汽車、消費服務業、金融服務業、IC
	江蘇	電子業、機械製造、化工、鋼鐵、紡織、食品加工、服務業

<sup>48</sup> 孫明德，「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前景與問題」，台灣經濟月刊(台北)，2004 年 1 月，頁 78-83

	浙江	輕紡、電子高科技、軟體、旅遊服務業
南部	福建	汽車、電子、食品、塑膠
沿海 地區	廣東	農業、傳統製造業、食品加工、汽車、化工、電子業、電腦周邊、 紡織、成衣
	廣西	旅遊、農業、輕工業

資料來源：本研究

若由兩地工資水準來觀察要素管理的能力，則長江三角洲等地所提供的工資水準較高，一項調查顯示，長三角 6 城市企業新員工的工資平均數，要比全國 24 個城市企業新員工的工資平均數高 8.5%，這表明長三角地區比較注重人力資本的投入。<sup>49</sup>而珠江三角洲的 12 年來平均的月工資只提高了 68 元<sup>50</sup>，如廣東省的最低工資規定每月為 510 元，不僅低於上海市（635 元）和江蘇省（620 元），而且還低於山西省（520 元）等部分內陸地區。<sup>51</sup>在這樣的情況下，區域經濟發展上的差異也成為大陸部分地區勞動力短缺的另外一項因素。換言之，兩地經濟發展模式中對於勞動管理的能力可能是導致其工資條件不同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麼若是以此來看，則可得出一項合理的推論，工資條件的差異若是來自於勞動條件的不同，那麼不同的地方經濟發展模式中的管理行為將會影響勞動條件的好壞，而現今大陸地方經濟管理模式之所以有所差異，則主要又可歸因於政府行為的不同，重視勞動要素將之視為人力資本的地方，對於勞動管理的體制建構與政策自當會審慎規劃與執行；而將勞動要素僅單純的視為人力資源，依賴要素稟賦來提供勞動的地區，則自然就會採取消極的管理方式，進而導致勞動供需全憑市場自行調節。那麼是否是因為不同的地方政府對於生產要素的管理行為上的差異，導致了不同地區勞動供需的情況？換言之，大陸現階段勞動供給短缺的現象背後，揭示出一個值得觀察的重要議題，是否正因為區域經濟形態的差異與地方政府所採取的不同態度，進而使得不同的發展模式在面對勞動供需的問題上擁有不同的解決能力？這遂成為本文欲回答的主要問題。

#### 第四節、政府管理模式對於勞動要素供給與運用的影響

無論是就農工產品價格條件、工資水平或工作條件、區域發展模式等角度，要理解大陸勞動力供需情況都必須將地方政府的管理模式納入考量，因為透過政府的政策介入

<sup>49</sup> 「從經濟增長直面勞動力瓶頸 高素質勞動力短缺」，中國人力資源網，  
[http://www.hr.com.cn/articles/new\\_eyes/new\\_detail.php?id=22641](http://www.hr.com.cn/articles/new_eyes/new_detail.php?id=22641)。

<sup>50</sup> 「國家發佈民工荒調查報告：四原因導致民工短缺」，中國經濟網，  
[http://big5.ce.cn/new\\_hgj/hgplun/more/200409/08/t20040908\\_1701970.shtml](http://big5.ce.cn/new_hgj/hgplun/more/200409/08/t20040908_1701970.shtml)。

<sup>51</sup> 「勞動力短缺：中國勞動力市場發生史無前例的結構性變化」，中國觀察，<http://china.intlshop.com>。

將可以達到兩個重要的作用：第一，制定和實施有利於農業剩餘向工業轉移的制度政策體系；第二，減少農業部門的內部消耗而使之產生更大的剩餘。<sup>52</sup>

而若就目前大陸經濟發展的情況來看，由於各地發展模式不同，因此在整個生產模式與環境的建構過程中也就出現了差異，有些地方政府採取消極無為的態度（如珠江三角洲），而也有些地方政府則表現出如發展型國家的特色（如長江三角洲），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同地方政府對於當地勞動要素管理的模式自然也就會有差異。

地方政府若單純的僅以市場機制自由運作的方法來管理地區勞動要素，那麼勞動供需就成了企業自身的問題，而企業基於成本考量，自然會在成本效益的理性抉擇下，採取特定的勞動管理方式，但若政府採取較為主動介入的作為，那麼在提升勞動生產力的前提之下，地方勞動供需就成為政府與企業共同的責任，在這種運作建制中，將能夠較合理的提供解決勞動供需的方案。那麼透過對於兩種不同的勞動管理模式中政府角色與施政能力的比較與觀察，自然能夠合理的掌握中國大陸轉型時期的發展因素，同時也增強吾人對於中國大陸現今經濟運作的理解。

---

<sup>52</sup> 張秀生、陳先勇，「二元結構與經濟發展」，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學術論文，見



## 附錄：參考文獻

### 中文文獻

- 丁仁方，1999，《威權統合主義—理論、發展與轉型》，台北：時英出版社。
- 于宗先，1995，「工業升級的過去與未來」，見高希均、李誠主編，《台灣經驗再定位》，台北：天下文化出版。
- 中央黨校經濟研究中心課題組，2000，「西部大開發的經濟學思考」，《經濟研究》NO. 6：33-35。
- 中市市場經濟研究所主編，1997，《國有企業股份制改組理論與實務（上）》，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
- 中國人民銀行重慶營業管理部課題組，2000，「西部大開發的金融政策支持系統研究」，《改革》2000(5)：79-85。
-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宏觀學科課題組，1997，「改革的累積效應和一致性穩定政策選擇」，《經濟研究》（北京）NO. 9：3-5。
- 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第十一版。
- 尹保雲，1999，「官僚制與中國的現代化」，《中國社會科學季刊》27：69-82。
- 方生、桑百川、王雲平、王偉光等著，2000，「東部企業開發西部的成功經驗」，《當代財經》NO. 191：67-70。
- 方孝謙，1999，「企業改私、集團改股—從山東B鎮的股份（合作）制經驗論私有化問題」，《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NO. 29：33-51。
- 方孝謙，2000，「統合化或私有化？鄉鎮企業產權改革的政經效果初探」，《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內部討論會論文》。
- 王一鳴主編，1998，《中國區域經濟政策研究》，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
- 王小魯，1999，「農村工業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改革》（北京）1999(5)：97-106。
- 王信賢，2000，「中國大陸國企改革的『組織焊接』—『吳江絲綢股份有限公司』籌組之分析」，《中國大陸研究》43(12)：37-61。
- 王信賢，2000，「當代西方『中國研究』之新制度典範分析」，《中國大陸研究》43(8)：23-45。
- 王建主編，1998，《區域與發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王軍濤、陳子明主編，1996，《解除中國危機》，香港：明鏡出版社。
- 王振寰，1996，《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王國剛、劉志彪主編，1990，《經濟政策學概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 王紹光，1994，「國家在市場經濟轉型中的作用」，見吳國光編，《國家、市場與社會》，香港：牛津出版社。
- 王紹光、胡鞍鋼，1999，《中國：不平衡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北京：中國計畫經濟出版社。
-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1998，「美國30年代大蕭條對中國經濟的啟示」，《戰

略與管理》(上海) 1998(3)：76-85。

周立群、韓亮、余文波等譯，史丁格利茲 (Joseph Stiglitz) 著，1998，《社會主義向何處去—經濟體制轉型的理論與證據》，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四川省人民政府，1998，《四川年鑑-1998》，成都：四川年鑑社出版。

四川省科技顧問團辦公室課題組，2000，「四川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及對策」，《經濟體制改革》(成都) NO. 5：44-54。

四川省計畫經濟委員會計畫綜合處主編，1990，《四川省“八五”發展目標及對策研究》，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

四川省統計局編，2000，《四川統計年鑑—2000》，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布萊契 (Marc Blecher)，1997，「束鹿縣個案：私有化的侷限與國家的作用」，見甘陽、崔之元編，《中國改革的政治經濟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白永秀，2000，「西部大開發：政策支持的依據」，《經濟管理》2000(3)：45-46。

胡祖慶譯，白魯洵 (L. Pye) 著，1989，《中國政治的變與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石之瑜，1994，《中國大陸的國家與社會》，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任盛漢，2000，「中共官僚運作對外商投資的影響—以中外合資企業設立為例」，《共黨問題研究》26(7)：18-36。

于同申、蘇蓉生譯，托達羅 (Michel Todaro) 著，1991，《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上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朱國宏，1999，《經濟社會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江小涓等著，1999年，《體制轉軌中的增長、績效與產業組織變化—對中國若干行業的實証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西南財經大學課題組，2000，「四川主要工業產品缺乏競爭力現狀及形成原因」，《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0(5)：54-56。

何清漣，1999，「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中國經濟的反市場形態之根源分析」，《當代中國研究》67：20-40。

何增科，1996，「新制度主義：從經濟學到政治學」，見劉軍寧編，《市場社會與公共秩序》，北京：三聯書店。

劉書瀚譯，佐佐木信彰著，1999，《中國現階段經濟分析—來自日本的觀察與評價》，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冷則剛，1999，「大陸經貿政策的根源：國家與社會的互動」，見包宗和、吳玉山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吳大聲、居福田，1994，「蘇南模式」，見周爾鑾、張雨林編，《中國城鄉協調發展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吳介民，1997，「解釋中國鄉村快速工業化的制度動力：地方產權體制與非正式私有化」，《台灣政治學會第四屆年會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東吳大學政治學系主辦。

吳介民，1998，「中國鄉村快速工業化的制度動力：地方產權體制與非正式私有化」，《台灣政治學刊》NO. 3：3-63。

- 吳介民，1999，「治亂循環？中國的國家—社會關係變化的線索」，《「中共建政與兩岸分治五十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華歐亞學會等主辦。
- 吳玉山，1996，《遠離社會主義》，台北：正中書局。
- 吳玉山，1999，「中國大陸產權改革之回故與展望」，政治大學東亞所主辦，《「跨世紀兩岸高等教育學者」學術研討會論文》。
- 吳玉山，1999，「回顧中國大陸產權改革」，《香港社會科學學報》14：175-199。
- 吳江市人民政府、吳江市年鑑編纂委員會編著，1999，《吳江年鑑：1999》，合肥：黃山書社出版發行。
- 吳江市工業經濟協會，1998，「對鄉鎮企業改制後加強領導和管理的思考」，《蘇州農村通訊》（蘇州）NO. 23：17-19。
- 吳江市檔案局編，1999，《吳江十年大事記 1989-1999》，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
- 吳國光、鄭永年，1995，《論中央—地方關係》，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吳國光編，1994，《國家、市場與社會》，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吳敬璉，1999，「經濟改革二十年：實踐和理論的發展」，摘自俞可平、彭懷恩合編，《中國轉型的挑戰—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論文選—經濟社會篇》，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有限公司。
- 吳敬璉等著，1996，《漸進與激進—中國改革道路的選擇》，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 吳德榮，1993，「國家，市場，還是經濟管制？從四本東亞研究論著談起」，《香港社會科學學報》1993(1)：176-200。
- 宋林飛，2000，「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最新發展」，人民大學書報料中心，《社會學》2000(5)：51-59。
- 折曉葉、陳嬰嬰，2000，「產權制度選擇中的“結構—主體”關係」，《社會學研究》2000(5)：77-78。
- 李仁芳，1999，「財產權結構、專質性知識與管理統治效能之探索—台灣便利商店厚基組織論觀點的個案研究：統一超商 7-eleven」，見蔡敦浩主編，《管理資本在台灣》，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李京文，1999，《走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區域經濟》，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 楊淑娟譯，李侃如（K. Lieberthal）著，1998，《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台北：國立編譯館。
- 李英明主編，閔琦等著，1995，《轉型期的中國：社會變遷》，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 李強，1998，「評論：國家能力與國家權力的悖論」，見張靜主編，《國家與社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李稻葵，1996，「轉型經濟中的模糊產權理論」，見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編，《中國經濟學—199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李曉西，1996，「漸進與激進的結合：經濟為主導的中國改革的道路」，見吳敬璉等著，《漸進與激進—中國改革道路的選擇》，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 杜平等編著，2000，《西部大開發戰略決策若干問題》，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沈榮法主編，1997，《吳江十年調研成果集》，北京：新華出版社。

- 周民良，2000，「經濟重心、區域差距與協調發展」，《中國社會科學》NO. 2：42-53。
- 周振華，1999，《體制變革與經濟增長—中國經驗與範式分析》，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 周振華、黃復興，1998，《積極推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周偉林，1997，《中國地方政府經濟行為分析》，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周淑蓮，1998，「二十年來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回顧與展望」，《中國社會科學》（北京）NO. 6：44-58。
- 周紹朋、王建，1998，《中國政府經濟學導論》，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 周雪光，1999，「西方社會學關於中國組織與制度變遷研究」，見涂肇慶、林益民編，《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西方社會學文獻述評》，香港：牛津出版社。
- 林光彬，2001，「西部大開發中的五種制度障礙」，《改革》2001(2)：76-79。
- 林凌、劉世慶，2000，「四川與中部省區的差距與思考」，《經濟體制改革期刊》2000(2)：5-13。
- 林毅夫，2000，《再論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林毅夫，2000，「展望新千年的中國經濟」，見林毅夫、海聞、平新喬等主編，《中國經濟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7，「再論中國國有企業問題所在與出路選擇」，《中國社會科學》NO. 21：138-147。
- 林毅夫、蔡昉、李周，2000，「中國經濟轉型時期的地區差距分析」，見林毅夫、海聞、平新喬主編，《中國經濟研究—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內部討論稿選編 1995-199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林毅夫、蔡昉、李周著，1996，《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三聯書店。
- 林毅夫、蔡昉、李周著，2000，《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林繼文，2001，「創設、選擇與演化：制度形成的三個理論型範」，《中國政治學會年會論文集》。
- 松山公紀，1998，「經濟發展：協調問題」，見青木昌彥、金滢基、奧野-藤原正寬編，《政府在東亞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比較制度分析》，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 沈漢譯，波吉 (G. Poggi) 著，1997，《近代國家的發展—社會學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明軒、邱如美合譯，波特著 (M. Poter)，1996，《國家競爭優勢—上》，台北：天下文化。
- 周旭華譯，1998，波特著 (M. Poter)，《競爭策略：產業環境及競爭者分析》，台北：天下文化。
- 邱澤奇，1998，「在政府與廠商之間：鄉鎮政府的經濟活動分析」，《東亞季刊》29(1)：30-56。
- 邱澤奇，1998，「鄉村選舉與村鎮組織關係」，見陳明通、鄭永年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出版社。
- 邱澤奇，1998，「鄉鎮企業改制與地方威權主義的終結」，見中華歐亞學會、太平洋世紀研究所主辦，《“經濟改革與政治變遷：大陸改革二十年回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 邱澤奇，1999，「在工廠化和網絡的背後—組織理論的發展與困境」，見《社會學研究》（北京）1999(4)：1-25。
- 邱澤奇，1999，「鄉鎮企業改制與地方權威主義的終結」，《社會學研究》（北京）1999(3)：82-92。
- 金碚、丁易編著，1997，《轉軌時期的產業調整—國際經驗與中國的實踐》，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
- 青木昌彥、金滢基、奧野-藤原正寬，1998，《政府在東亞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比較制度分析》，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 侯承彥，2000，「中共北戴河會議」之評析，《共黨問題研究》26(9)：1-3。
- 姜新立編著，1997，《分析馬克思—馬克思主義理論典範的反思》，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姚文平，1999，「蘇南鄉鎮企業的技術創新問題分析」，見胡春惠主編，《中國大陸國有中小企業改革選擇探析》，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
- 思拉恩·埃格特森，1996，《新制度經濟學》，北京：商務出版社。
- 潘振民譯，施蒂格勒著，1996，《產業組織和政府管制》，上海：三聯書店。
- 柯榮住，1998，「鄉鎮企業及其改革中的利益分配：一個三方博弈模型」，《中國社會科學季刊》NO. 23：97-105。
- 丘宏義譯，柯爾著，2000，《數學與頭腦相遇的地方》，台北：天下文化。
- 胡代光、高鴻業主編，1996，《現代西方經濟學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胡必亮，1996，「“關係”規則與資源配置—對湖北、山西、陝西、廣東、浙江五省鄉鎮企業發展的典型調查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季刊》NO. 16：15-26。
- 胡家勇，1996，《政府干預理論研究》，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
- 胡寄窗著，1988，《一八七〇年以來的西方經濟學說》，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 胡鞍剛，1999，「旨在促進經濟發展的中國政治改革」，《改革》（北京）1999(3)：58-64。
- 胡鞍鋼、王紹光、康曉光，1996，《中國地區差距報告》，台北：中華歐亞學會。
- 張宗漢譯，韋德（R. Wade）著，1994，《管理市場—經濟理論與東亞國家由政府主導工業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唐士其，1998，《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夏小林，1999，「非國有經濟增幅連年回落實證分析-上」，《改革》（北京）1999(4)：77-84。
- 夏傳位，「中國未來五十年怎麼走？」，1999，《天下雜誌》（台北）NO. 10：250-251。
- 孫早，2001，「解讀西部開發：對政府作用的再審視」，《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1(3)：54-58。
- 孫林夫，2000，「蘇州經濟發展的回顧和前瞻」，《「全球化、蘇南經濟發展與台商投資」研討會論文集》，東吳大學社會系主辦。
- 孫祖培，1999，「國有、集體中小企業改革選擇與發展前景」，見胡春惠主編，《中國大陸國有中小企業改革選擇探析》，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
- 徐振國，2000，「從威權論、統合論到新國家論的轉折和檢討」，《理論與政策》24(2)：1-27。

- 徐斯勤，2001，「新制度主義與當代中國政治研究：理論與應用之間對話的初步觀察」，《中國政治學會年會論文》。
- 徐斯儉，1996，「中國大陸產權地方化對國家行政科層理性化之影響—以中國鄉鎮的農村工業化為例」，《海峽兩岸社會科學交流研討會論文》（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法學院主辦。
- 徐斯儉，2000，「中國大陸九〇年代之政治改革與制度變遷」，中央研究院大陸研究推動委員會、民族學研究所合辦，《中國改革開放的制度變遷：社會科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之研討會論文集》。
- 徐滇慶、李瑞，1999，《中國大陸政府政策與經濟發展》，台北：中華歐亞學會。
- 徐滇慶、倪瑩離，1999，「中國區域經濟不平衡發展」，見方星海、左學金主編，《民營經濟與中西部發展》，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時和興，1996，《關係、限度、制度：政治發展過程中的國家與社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劉曉勇、應春子等譯，格澤戈爾茲·科樂德克（Grzegorz Kolodko）著，2000，《從休克到治療：後社會主義轉軌的政治經濟》，上海：遠東出版社。
- 特約評論員，2000，「到西部去」，《經濟管理》3：11~12。
- 袁開宇，1999，「南街是集體化歷程」，《中國社會科學季刊》NO. 27：1-9。
- 郝聯峰，袁星侯著，2000，「中國財政貨幣政策為何不能四兩撥千斤」，見《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3：53-57。
- 馬戎、黃朝翰、王漢生、楊沐合編，1994，《九十年代中國鄉鎮企業調查》，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馬凱主編，1994，《台灣工業發展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
- 高永光，1995，《論政治學中國家研究之新趨勢》，台北：永然文化出版公司。
- 李少軍、劉北成譯，曼恩（Michel Mann）著，1994，《社會權力的來源—自源起到西元1760年的權力史》，台北：桂冠出版公司。
- 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1999，「買方市場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特點和調控政策」，《國民經濟管理與計畫》（北京）NO. 10：82-83。
- 康曉光，1999，《權力的轉移—轉型時期中國權力格局的變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張五常，1989，《中國的前途》，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張弘遠，2000，「中國大陸經濟轉型中後發展地區政府角色與企業行為」，《東亞季刊》31(1)：51-90。
- 張克難，1996，《作為制度的市場和市場背後的制度》，上海：立信會計出版社。
- 張春興，1996，《教育心理學》，台北：東華書局。
- 張軍，1997，《“雙軌制”經濟學：中國的經濟改革（1978-1992）》，上海：三聯書店。
- 張莉莉、朱添進、鄭克俊、宋芬玫，1995，《園藝種苗生產》，台北：地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張景旭，蕭新煌，1997，「台灣發展與現代化的宏觀社會學論述」，羅金義、王章偉，《奇蹟背後：解構東亞現代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張維迎，1997，「所有制、治理結構及委託—代理關係」，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編，《中國經濟學-199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張維迎，1999，《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張曙光，1997，「政府、農民和市場—山東惠民“大市場”要減“小”市場與浙江義烏小市場變成大市場案例的比較和分析」，《中國社會科學季刊》NO. 20：5-18。
- 張曙光，1997，「國家能力與制度變革和社會轉型」，見董輔初等著，《集權與分權—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構建》，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 盛洪，1996，「為什麼人們會選擇對自己不利的制度安排」，盛洪主編，《中國經濟學—1995》，上海：人民出版社。
- 莫里斯·邁斯納著，1992，《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郭立宏、高煜，2000，「西部大開發中的西部資本市場：供求現況、競爭挑戰、發展選擇」，《改革》2000(5)：86-94。
- 郭克莎，2000，「中國工業化的進程、問題與出路」，《中國社會科學》NO. 3：60-71。
- 郭建中，1997，「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三種模式」，見《台灣政治學會第四屆年會學術研討會論文》，東吳大學政治學系主辦。
- 郭熙保主編，1998，《發展經濟學經典論著選》，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 陳永發，1999，《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
- 陳自芳著，1999，《不平衡推進與高增長》，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
- 陳志柔，2000，「中國大陸農村產權制度變遷的地方社會基礎：經濟社會學的思考」，見《新世紀、新社會科技、勞動與福利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大學等主辦。
- 陳志柔，2000，「經濟改革與社會後果：回顧西方學界對於中國大陸制度變遷的研究」，《中國改革開放的制度變遷：社會科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之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大陸研究推動委員會、民族學研究所合辦。
- 陳佩華、趙文詞、安戈，1996，《當代中國農村歷滄桑—毛鄧體制下的陳村》，香港：牛津大學出版。
- 陳其林，1999，「產業政策：企業、市場與政府」，《中國經濟問題》(雙月刊)NO. 3：1-8。
- 陳東琪，2000，《新政府干預論》，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
- 陳武元、楊俊輝著，1995，《鄉鎮企業與國營企業比較研究》，成都：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
- 陳昭南、朱敬一等合著，1998，《經濟學》，台北：華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陳棟生、魏后凱、陳耀、劉楷著，1996，《西部經濟崛起之路》，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
- 陳耀，2000，「西部大開發要有新思路」，《經濟管理》NO. 1：50-54。
- 陸大道、薛鳳旋著，1997，《中國區域發展報告—1997》，北京：商務印書館。
- 傅殷才、顏鵬飛，1995，《自由經營還是國家干預》，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 博蘭尼，2000，「經濟：制度化的過程」，許寶強、渠敬東選編，《反市場的資本主義》，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黃樹民、石佳音、廖立文譯，博蘭尼著，2000，《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台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

- 彭懷恩，2000，《台灣政治發展的反思》，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
- 蔣琳琦譯，斯韋托扎爾·平喬維奇著，1999，《產權經濟學——一種關於比較體制的理論》，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 程曉農，2000，「轉型中的中國經濟體制」，《戰略與管理》，第六期：115-117。
- 顧忠華譯，舒樂賀（Wolfgang Schluchter）著，1986，《理性話與官僚化——韋伯之研究與詮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費正清等主編，1990，《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費正清等主編，1992，《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費孝通，1999，《九十新語（甲集）》，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工作論文。
- 陳琇里譯，費思（Liam Fahey）、藍道（Robert Randall）編，1990，《企業策略》，台北：商周出版。
- 費景漢，1994，「台灣經濟發展政策的演變過程」，見馬凱主編，《台灣工業發展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
- 馮俊，2000，「差距、收斂與投資：一個西部開發的劑量模型」，《當代財經》N0.187：19-24。
- 黃仁宇，1993，《中國大歷史》，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黃仁宇，2001，《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台北：聯經。
- 黃紀、陳忠慶譯，1978，《政治學的範圍與方法》，台北：幼獅圖書公司。
- 黃連城，2000，「西部大開發是第二個大局」，《鏡報月刊》2：30-32。
- 黃凱，1999，「中國大陸企業投資效益低下成因分析」，見胡春惠主編，《中國大陸國有中小企業改革選擇探析》，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
- 黃朝翰、楊沐，1999，「國企改革、企業冗員和職工下崗」，《改革》（北京）1999(5)：25-31。
- 素蘭譯，黃樹民著，1994，《林村的故事》，台北：張老師出版社。
- 楊小凱，1997，《當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楊公朴、夏大慰主編，1998，《產業經濟學教程》，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 楊目、趙曉、江慧琴，1999，「宏觀政策調整與堅持市場取向—1998年中國經濟政策回顧與思考」，《改革》1999(1)：11-20。
- 楊祖功、田春生、莫偉等著，1999，《國家與市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雷喻義主編，1998，《四川年鑑》，成都：四川年鑑社。
- 張金鑑譯，福克思（Ben Fowkes）著，1998，《東歐共產主義的興衰》，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臧躍如，1999，「買方市場下的企業行為特點研究」，《改革》1999(5)：18-24。
- 齊桂珍主編，1998，《中國所有制改革20年》，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 劉仁傑，1998，《日本的產業策略》，台北：聯經。
- 劉世定，1999，「嵌入性與關係契約」，《社會學研究》4：75-88。
- 劉立喜編著，1999，《可轉換公司債券》，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 梁小民譯，劉易士（Arthur Lewis）著，1997，《經濟增長理論》，上海：三聯書店。



- 劉茂才主編，1997，《行政區劃改變後四川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及對策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劉國光，1999，「對當前經濟形勢與宏觀調控一些問題的看法」，《改革》1999(5)：1-13。
- 劉國光，2000，「21世紀初中國經濟增長問題」，《中國社會科學》NO. 4：4-10。
- 劉雅靈，1995，「中共國家能力之轉型：歷史分析」，《台灣社會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國科會專題計畫成果研討會論文集》，東海大學社會系／國科會人文處社會組。
- 劉雅靈，1997，「中國準世界經濟體系：1949—1990s」，《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會論文》。
- 劉雅靈，1999，「中國國內市場的分裂—計畫經濟的制度遺產」，《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29：1-32。
- 劉雅靈，2000，「強制完成的經濟私有化：蘇南吳江經濟興衰的制度基礎」，《政治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會論文》。
- 劉鶴、楊偉民，1999，《中國的產業政策—理念與實踐》，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 厲以寧，1991，《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
- 樊綱，1994，《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與綜合》，上海：三聯書店。
- 樊綱，1995，《市場機制與經濟效率》，上海：三聯書店。
- 歐陽新宜，「功能論者與馬克思國家論者在兩岸關係議題上的對話」，《中國大陸研究》43(5)：49-69。
- 蔣和勝、王德忠，1999，「論我國當前生產過剩的特點及對策」，《四川大學學報》(成都) NO. 4：21-24。
- 蔡明璋，1993，「國家活動的向度：跨國資料的因素分析」，《中國社會學刊》NO. 17：53-78。
- 鄭永年，1999，《朱鎔基新政》，新澤西：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 鄭永年，2000，《政治漸進主義》，台北：中華歐亞教育基金會。
- 鄭為元，1999，「發展型『國家』或發展型國家『理論』的終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4：1-68。
- 鄧正來，1997，《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四川：成都。
- 劉瑞華譯，諾思(Douglass North)著，1994，《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台北：時報文化。
- 劉瑞華譯，諾思著，1995，《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台北：時報文化。
- 錢穎一、巴里·溫加斯特，1998，「制度、政府干預和經濟發展—對中國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的比較」，見青木昌彥、金滢基、奧野-藤原正寬編，《政府在東亞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比較制度分析》，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 錢穎一、許成鋼，1997，「中國非國有制經濟出現和成長的制度背景」，見甘陽、崔之元編，《中國改革的政治經濟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鮑大可(Doak Barnett)著，1998，《中國西部四十年》，北京：東方出版社。
- 戴慕珍，1997，「中國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制度基礎」，甘陽、崔之元編，《中國改革的政治經濟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簡·斯維納與潘承芬著，1994，「四縣鄉鎮企業的發展模式」，見威廉·伯德、林青松合編，

- 《中國鄉鎮企業的歷史性崛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龔小夏譯，魏昂德（Andrew Walder）著，1996，《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魏昂德（Andrew Walder），1999，「一九四九年共產主義革命後中國的社會變遷」，涂肇慶、林益民主編，《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西方社會學文獻評述》，香港：牛津出版社。
- 龐建國，1993，《國家發展理論—兼論台灣發展經驗》，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龐建國，1997，「國家在東亞經濟轉化中的角色」，羅金義、王章偉，《奇蹟背後：解構東亞現代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羅伯特·韋德著，1996，「東亞的產業政策：引導市場還是跟隨市場」，見加里·杰里菲與唐納德·懷曼主編，《製造奇蹟—拉美與東亞工業化的道路》，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
- 羅家德譯，Mark Granovetter 著，「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鑲嵌問題」，見羅家德主編，《網絡與組織》（無出版細目）。
- 羅榮渠主編，1997，《東亞現代化：新模式與新經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譚秋成，2000，「市場的性質與企業所有權安排—鄉鎮集體企業產權改革的經驗」，《中國農村觀察雙月刊》2000(1)：30-36。
- 邊裕淵，2000，「大陸的經改理論及成長來源之分析」，《中共研究》34(2)：104-123。
- 蘇耀昌、趙永佳，1997，「綜論當前關於東亞發展的幾種觀點」，見羅金義、王章偉編著，《解構東亞現代化：奇蹟背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顧昕，1998，「小公司化的政治經濟學：地方政府與小型國有企業的制度轉型」，見中華歐亞學會、太平洋世紀研究所合辦，「經濟改革與政治變遷：大陸改革二年回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 英文文獻

- Baum, Richard and Alexei, Shevchenko, 1999, "The 'State of The State' ," in Merle Goldman & Roderick Macfarquhar ed.,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lecher, Marc, 1991, "Development State, Entrepreneurial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t Reform in Xinju Municipality and Guanghan County," in Gordon White ed., *The Chinese State in Economic Reform - The Road To Crisis*. New York: M. E. Sharpe.
- Burt, Ronald, 1982, *Toward A Structural Theory of Ac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Cao, Yang and Victor Nee, 2000, "Comment: Controversies and Evidence in 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4): 1175-1189.
- Child, John, 1994, *Management in China During The Age of Ref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ih-Jou Jay Chen, 1999, "Lo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in Southern Fujian," in Oi, Jean and Andrew Walder ed.,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rawford, Beverly, 1995, *Markets, States, and Democracy*. Oxford: Westview Press.

Duckett, Jane, 1998, *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Dutt, Amitava and Kwan Kim, 1994, *The State, Markets and Development – Beyond The Neoclassical Dichotomy*. Vermon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mpany.

Elster, Jon Claus Offe and Ulrich Preuss, 1998,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Rebuilding The Ship At Se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vans, Peter, 1979, *Dependent Development*.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vans, Peter, 1995, *Embedded Autonomy –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yal, Gil, Ivan Szelenyi, Eleanor Townsley, 1998,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New York: Verso.

Fligstein, Neil, 1996, “Economic Sociology of The Transitions From Soci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4) : 1074–1081.

Fligstein, Neil, 1996, “Markets As Politics: A Political–Cultural Approach To Market Institu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 656–673.

Gerschenkron, Alexander,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ranovetter, Mark,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 1360–1380.

Gray, Jack and Gordon White, 1982, *China’ s New Development Strategy*. London: Academic Press.

Guthrie, Doug, 1999, *Dragon in A Three-Piece Su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arris, Nigel and David Lockwood, 1998, “Privatization and The State: Russia, Eastern Europe, East Asia,” in Jeffrey Henderson e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Europe in the Light of the East Asian Experienc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Hintze, Otto, 1994, “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State,” in John Hall ed., *The States: Critical Concepts – Vol. I*. London: Routledge.

Hobson, John, 1997, *The Wealth of States: 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llingsworth, J. Rogers and Robert Boyer, 1997, “Coordination of Economic Actors and Social Systems of Production. ” in Rogers Hollingsworth and Robert Boyer ed., *Contemporary Capitalism—The Embeddedness of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sing, You-Tien, 1998, *Making Capitalism in China: The Taiwan Conne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ang, Yasheng, 1996, *Inflation and Investment Controls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ornai, Janos,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uo, Cheng-Tian, 1998, “Privatization Within The Chinese State,” in Steve Chan, C. Clark, D. Lam ed., *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Lawrence J. Lau, Yingyi Qian and Gerard Roland, 2000, “Reform Without Losers :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 s Dual-Track Approach To Transi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8(1): 120-143.

Lee, Kuen, 1991, *Chines Firms and The State in Transi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Levi, Margaret and Richard Sherman, 1997, “Rational Compliance with Rationalized Bureaucracy,” in Christopher Clague ed.,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Growth and Governance in Less-Developed and Post-Socialist Countri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Levi, Margaret, 1988, *Of Rule and Revenu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eberthal, Kenneth and David Lampton, 1992,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ew, Leong, 1997, *The Chinese Economy in Transition: From Plan to Market*. Glo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n, Justin Yifu, 1997, “Reform and Development: Lesson From Transitional Economies in East Asia,”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經濟研究中心內部討論稿系列(英文版), No. E1997010。

Lin, Nan, 1995, “Local Market Socialism: Local Corporatism in Action in Rur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24 : 301-354.

Lipset, Seymour Martin and Gyorgy Bence, 1994, “Anticipations of The Failure of Communism,” *Theory and Society* 23 : 169-210.

Liu, Ya-Lin, 1992, “Reform From Below: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Local Politics in Th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of Wenzhou,” *China Quarterly* 130: 293-316.

Lu, Xiaobo and Elizabeth Perry, 1997, *Danwei :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M. E. Sharpe.

Mann, Michel, 1994,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s: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in John Hall ed., *The States: Critical Concepts—Vol. I*. London: Routledge.

Mccormick, Barrett, 1996, "Concluding Thoughts: Reforming Socialism in China - Another New Dragon?," in Barrett Mccormick and Jonathan Unger, *China after Socialism*. New York: M. E. Sharpe.

Migdal, Joel, 1988,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aughton, Barry, 1996,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e, Victor and David Stark, 1989,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China and East Europ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Nee, Victor and Sijin Su, 1998,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Robust Economic Performance: Public-Sector Industrial Growth in China," in Jeffrey Henderson e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Europe in The Light of The East Asian Experience*. New York: St. Martin' s Press.

Nee, Victor and Yang Cao, 1999, "Path Dependent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Stratification in Hybrid Mixed Economies," *Theory and Society* 28: 799-834.

Nee, Victor, 1991,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267-282.

Nee, Victor, 1996,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Changing Mechanism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4): 908-949.

Noalan, Peter, 1995, *China' s Rise, Russia' s Fall*. London: Macmillan Press.

Nolan, Peter and Dong Fureng, 1990,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Its Futur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Post-Mao Refor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Oi, Jean and Andrew Walder, 1999,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Oi, Jean, 1989,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i, Jean, 1999, *Rural China Takes off*.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earson, Margaret, 1997, *China' s New Business Elite -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erkins, Dwight, 1966, *Market Control and Planning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erry, Elizabeth and Christine Wong, 198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hilippe, Schmitter, 1974,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in Pike Fredrick and Thomas Stritch ed., *The New Corporatism: Social-Political Structures in The Iberian World*. New York: Notre Dame Press.

Pierson, Christopher, 1995, *Socialism after Communism: The New Market Soci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Ruf, Gregory, 1999, "Collective Enterprise and Property Rights in A Sichuan Village: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Managerial Corporatism," in Jean Oi and Andrew Walder ed.,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chs, Jeffery and Wing Thye Woo, 1997,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Discussion Paper No. 1793*. Harvard University.
- Philippe, Schmitter, 1974,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Review of Politics* 36: 92-95.
- Shue, Vivienne, 1988,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kocpol, Theda, 1973, "A Critical Review of Barrington Moore's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Politics and Society* 4: 18-24.
- Skocpol, Theda, 1985,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Peter Evans, D.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olinger, Dorothy, 1993, *Chin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Statist Legacies and Market Reforms 1980-1990*. New York: M. E. Sharpe.
- Stark, David, 1996, "Recombinant Property in East European Capit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4): 993-1027.
- Steinfeld, Edward, 1998, *Forging Reform in China: The Fate of State-Owned Indus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zelenyi, Ivan and Eric Kostello, 1996, "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 Toward A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4): 1082-1096.
- Unger, Jonathan and Anita Chan, 1995, "China, Corporatism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3): 29-53.
- Unger, Jonathan and Anita Chan, 1999, "Inheritors of The Boom: Private Enterprise and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 in A Rural South China Township," *The China Journal* (42): 45~74.
- Van Ness, Peter, 1989, *Market Reforms in Socialist Society: Comparing China and Hungary*.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Walder, Andrew, 1995,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2): 263-301.
- Walder, Andrew, 1995,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alder, Andrew, 1998, *Zouping in Trans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Zhonghui, 1997, *A Study of Public Policy Influences Upon The Development*

- of China's Rural Enterprises 1978-1992*. Aldershot: Avebury.
- Wank, David, 1999, *Commodifying Communism—Business, Trust and Political in a Chinese C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iss, Linda and John Hobson, 1995,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Weiss, Linda, 1994,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 in East Asia: The Changing Basis of State Capacity," *Asian Perspective* 18(2): 113-118.
- Weiss, Linda, 1998, *The Myth of The Powerless St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Weiss, Linda, 1999, "State Power and The Asian Crisis," *New Political Economy* 4(3): 317-342.
- White, Gordon and Paul Bowles,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te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China's Financial Reform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Barrett McCormick and Jonathan Unger ed., *China After Socialism*. New York: M. E. Sharpe.
- White, Gordon, 1988,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East As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White, Gordon, 1991, *The Chinese State in The Era of Economic Reform: The Road To Crisis*. New York: M. E. Sharpe.
- Whiting, Susan, 1999, "The Regional Evolution of Ownership Forms: Shareholding Cooperatives and Rural Industry in Shanghai and Wenzhou," in Jean Oi and Andrew Walder ed.,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nckler, Edwin, 1999,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in China-Institution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es*.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Woo-Cumings, Meredith, 1999,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Yang, Dali, 1999, "Economic Crisis and Market Transition in The 1990s," in Edwin Winkler ed.,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in China-Institution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es*.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Zhou, Xueguang, 2000,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4): 1135-1174.
- Zhou, Xueguang, 2000, "Reply : Beyond The Debate and Toward Substan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4): 1190-1216.
- Zweig, David, 1997, *Freeing China's Farmers Rural Restructuring in The Reform Era*. New York: M. E. Sharpe.
- 徐斯儉, 1999, "The Central-Local Relation in PRC under the Tax Assignment System: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 1994-1997,"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會論文》。